

难忘——惊心动魄的历险
感人——缠绵悱恻的恋情



丝绸新路上的中国姑娘

ITALA 北京—巴黎汽车远征纪实

胡兰波



悦目——绮丽多采的景色
陶醉——奇异独特的风情

伊塔拉经受严寒考验，零下22℃



夜闯险路



过第一个塌方





◀ 在青藏高原上

登上青海的日月山 ▶



◀ 过过伊塔拉车手的瘾

一九八五年，我二十五岁。结束了大学的学业，幻想周游世界。不应该吗？二十五年在中国，现在该去认识这个庞大的世界。

第一个国家当然是法国。在中学和大学念的都是法文，尤其上中学时学点东西是那么不易！好多年来，我一直做周游世界的梦，尤其想去看看法国，看看那些大作家、大艺术家的故土。

四月十五日，我从北京坐火车到香港，又从香港坐上斯里兰卡航空公司的班机到了巴黎。出发前匆匆忙忙的，顾不上多想，待火车开动那一刻，才意识到这趟旅行是冒险。怀里仅仅揣着几百个美金，就要去巴黎这个花花世界打天下了。

飞机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我害怕了，怕自己会在这个世界失败。

四年过去了。

我在巴黎大学得到了文学硕士及准博士文凭，又在阿维尼翁戏剧节、巴黎东剧院及法国许多城市演出了话剧、舞蹈等，甚至还去了非洲印度洋边的留尼旺岛及欧洲几个国家演

出。应该说成绩不小，但我总是不满足。

一九八九年二月，中国的春节就要到了。忽然，乡愁紧紧地揪住了我的心，揪得好痛！四年了，没与亲人过一个春节！其实，若不去巴黎十三区的唐人街走走，根本也不会感到什么过年的气氛。然而，我的耳边却总响着年卅那热热闹闹的鞭炮声。

恰巧，她来了。谁也不会忘记中国女排那光荣的岁月；她便是三号，大名鼎鼎的队长曹慧英。如今，她早已告别了排球生涯，当上了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副总经理。我们相识有十年了，却有八年未曾相见。

她住在巴黎最繁华的商业街——奥斯曼大街的玛丽亚女王旅馆。那天下午我到的时候，她正与意大利徒步旅行社经理谈事，她便把我介绍给这位和和善善的坦帝先生。

“我的妹妹兰波。”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还有这么个迷人的妹妹在巴黎！”他真相信了我们是姐俩。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女人总是迷人的。

坦帝非常感兴趣地问起我在巴黎的生活。

“我是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的学生，也是中国旅法黄河艺术团舞蹈演员及报幕员。”

“真的！”坦帝先生盯着我看了一阵。“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参加北京—巴黎汽车远征？这一趟我们将用三个月走二万二千公里。你可以为意大利电视台做中国和巴黎部分报导。”

我？汽车远征？三个月？二万二千公里？那是探险游记中英雄干的。我睁圆了眼睛。

“您开玩笑吧？”我笑了。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走这

一趟？你说！”他的神情告诉我他确是严肃的。

“当然！”热血涌到了我的脸上。

坦帝先生随即开始给意大利电视台正在巴黎的导演打电话，讲的是意大利语，听不懂，但我知道是在讲我。

一九〇七年，法国《晨报》曾组织了一次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意大利王子希皮奥·博尔盖塞、记者巴尔基尼和机械师巴泽提驾驶的意大利产伊塔拉(ITALA)35—45HP型汽车，比其余四辆法国和荷兰车早两周抵达终点巴黎。

两年前，菲亚特汽车公司将这辆伊塔拉老爷车从都灵市汽车博物馆请出，投重资翻修。今年三月，这辆具有光荣历史的老车将再上征程。所不同的是，一九〇七年此车行程是一万六千公里，从北京经蒙古，再横穿西伯利亚进欧洲。

这次行程将是二万二千里，沿中国丝绸之路，穿欧亚大陆，途经十个国家。并且，将有九辆菲亚特大小新车陪伴。曹慧英正是为此壮举来巴黎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因为中国境内的行程将由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负责。

这天正是坦帝五十三岁生日，他请我们在巴黎歌剧院旁的“大咖啡厅”饭店吃海鲜。意大利电视台的两个导演也来了，大概是对我进行目测。当然，我能否参加这次远征，这要取决于电视台及菲亚特的头头们。

这个春节过得实在是开心，我和曹慧英天天在一起，我也天天幻想着这趟冒险，若能参加，这比当年从北京来巴黎要多不知多少倍的浪漫色彩。

两周后，坦帝终于从米兰来电话：

“请立即飞北京，我们在中国见面！”。

乌拉！我就要成为北京—巴黎汽车远征的英雄啦！我相信，至今还未有一个中国人干过这件事，我是第一个！女的！

“别太得意了，也许在半路你将会被抬上担架，被送上飞机。二万二千里不是好玩的！”朋友们提醒我。

这倒是真的。十七岁时患了肺结核，差点叫大夫给判成废料。住院时还拚命念法文，大夫再三劝我：不可太累，即便法文念得再好，有了这个病，也做不了太多的工作，还是清心过一辈子为好。由于这个病，在大学也是历尽坎坷。来法国以后，为面包而奔波，为学业而奋斗，虽未病倒过，但也总是三天两头不舒服。

这一次，我能成功吗？

一、中国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我从巴黎戴高乐机场登上中国民航的班机，机舱里大多是去中国旅游的法国人，我这是到法国四年来第二次回北京，第一次已是两年前的了。尽管早已习惯巴黎，尽管已交了许多朋友，但思乡的情愫总是那么强烈。一想到先能回家，后能远征，兴奋得嫌飞机飞得太慢。

在意大利人到达之前，我有一周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可还有八个国家的签证要办，幸好有哥哥帮忙，否则这一周还不够为这些破事忙的呢！

三月二十日下午，意大利北京—巴黎伊塔拉老车远征队抵达北京。

那天阳光灿烂，天空蔚蓝。我同曹慧英等几位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朋友去机场迎接。由于行李过多，远征队最后走出海关。除了要上路的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发车仪式，热热闹闹浩浩荡荡从海关检查口涌出一大批。队员的

行李都是一样的，蓝、绿两色，一长一短，上面写着：ITALA · 1989 北京—巴黎远征。

从这天起，我将和所有队员一起住到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国际饭店。三月份还不是旅游旺季，可十五层的大楼已住得满满当当的。

远征队在北京将有五天的活动。我由于不会讲意大利语，到底没有为电视台做解说，而成了翻译。然而，队员中会讲法文的寥寥无几，我不得不用上我那蹩脚的英语。

一九〇七年驾驶伊塔拉完成北京—巴黎之旅的那个记者巴尔基尼的孙子这次也来参加远征。他爷爷在一九〇六年曾在北京生活过一年，后来写出了几本书谈他的这段生活及那趟令意大利人骄傲的拉力赛。

我每天陪着电视摄制组满北京地跑，晚上又要参加各部门为老车远征队举行的宴会。还没上路，我已感到疲惫不堪了。

这天早晨，我在饭店的大厅里听坦帝布置工作，发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盯得我心扑扑直跳。他的头发已呈灰白色，但脸还年轻，不过四十岁模样。他手扶摄影机架，眼睛深邃透明，鼻子挺直，嘴部曲线清晰。那张脸真诚英俊。后来，我们上了一辆车去拍片，才知道他是电视台的灯光师，叫卡尔罗。

我们都等着看伊塔拉这辆老车，除了坦帝及菲亚特公司的人，大家还都不认识它呢！在远征队到达北京之前，伊塔拉及九辆新车统统都被空运到北京。九辆新车中有五辆小车，二辆中型工具车，一辆电视台的大轿车及一辆装卫星转播设备的邮电部大轿车。电视台运来三架日本索尼牌摄影机，到北京一开箱，有二架已被窃。由于飞机曾在两个机场停留过，弄不清是在哪里被盗的，电视台只好又派一人专程从意大利赶来

送摄影机。时间紧迫，走得匆忙，那人连中国签证都没办，被拦在机场海关进不来，还是曹慧英去机场给“保”进来的。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为北京—巴黎汽车远征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坦帝硬是把我拉上主席台，向大家说：

“就是这位中国姑娘将同我们一起远征！”

在掌声中我的心使劲儿地跳，似乎我这二十几年从未如此激动过，毕竟十一亿中国人中唯我有这个运气。

新闻发布会后，我第一次有幸见到了伊塔拉。它停在国际饭店门口，军绿色的车身，敞蓬，可坐三人，车的前身用意大利文写着“北京”，后身写着“巴黎”。车头有两个大车灯，分别写着“1”，这是纪念伊塔拉在一九〇七年的拉力赛中获第一名，这种老式车，中国人恐怕只有在西方电影中才见过类似的。

二十四日，伊塔拉将开到长城脚下，由意大利电视台为它拍个最壮丽的镜头。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它早晨四点就上路，生怕再晚些这怪模怪样的老车会吸引众多围观者，堵塞交通。实在岂有此理！谁敢到马路中去挡车？

三月份，北京的清晨仍是寒冷，我们披星戴月上了路，到达长城脚下时，只见金红色的朝霞已洒满在这巍峨的巨龙上。我已有十几年未来过长城了。眼前的长城，虽然美丽壮观，但怎么不如记忆中的宏伟呢？也许那时候看长城还是个孩子，如今腿长长了，满世界的流浪，看得多了，长城也就变小了。这几年在法国，整天跟法国人吹北京，总也忘不了说长城，还娓娓动听地讲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要上路了，又要告别北京和亲人了，我的心充满惆怅。中午在楼下的意大利餐厅吃面条，禁不住两行眼泪噼哩叭啦掉在盘子里。卡尔罗坐在我对面，从口袋中掏出一块不大干净的手绢递给我。我抬头望着他真诚的眼睛，心中产生了一种依

赖。

这些天，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晚上的宴会又常坐一桌，他总是那么开朗热情。在意大利使馆的酒会上，我穿上那双在巴黎买的超高跟鞋，脚受了二十九年从没受过的委曲。卡尔罗就帮我来回跑着拿吃的。远征队里唯一的法国人芒德利说我找到了一个骑士。他大概说的是法国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中世纪为爱情而赴汤蹈火的骑士吧！若真能得到这样的骑士，这辈子就活得太幸运了。

昨天我装模作样地给他看手相，告诉他将来有一个儿子。他反过来问我有几个，我说：“三个”。他调皮地哈哈大笑道：“怎么可能！我娶你作妻子，怎么会你有三个儿子，我才有一个！”“那么，我就有三个丈夫！”话这么说，我的心却怦怦直跳。

坦帝告诉我，我房间门口有二个行李是我的。我跑上楼把它们拖进房间。行李与其他队员的一样，大小不同，都是蓝色的。打开一看，大部分是运动衣裤，从里到外，冷暖俱全。还有睡袋、手电、水壶等，看样子真要吃苦了，我揉了揉拳头。

三月二十五日晚上，我们远征队全体队员汇集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车辆整齐地排成一行。我们在这里举行发车仪式。

初春的晚风凉飕飕的，天空没一颗星星。送行的人很多，大多拥在伊塔拉四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为发车仪式剪了彩。九时正，我们的车队上路了，伊塔拉开在最前面，车尾插着意大利、中国、欧洲共同体三面旗帜。车队两旁的人频频向我们挥手，我的亲人站在人群中，妈妈向我摆手笑着，这是妈妈第一次为我的远行送别。以往每当我上路，她总是关在房里哭泣，以至每次都难跟她说声“再见”。这次，父母一定是为我骄傲了，毕竟这车队中唯一的中国人是他们的女儿！

从人民大会堂到前门大街的马路两旁站满了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笑着，喊着，挥着手，车队难以前进。我为自己同胞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心扑扑一个劲儿地跳。我把头伸出车窗外，拼命挥手，挥得胳膊都酸了。到车队拐到前门大街时，有几个小伙子索性骑自行车飞奔起来，与我们并行前进。

坦帝开车，我坐在他旁边。远离了热闹的送行人群，他感慨地说：

“为了这趟远征，我整整准备了七年！”

他手握方向盘，脸上显得十分激动。我们要经过的这十个国家里，有好几个很难达成协议。比如伊朗，前几年一直打仗；苏联，条条框框也多；中国境内，除了走丝绸之路，还要经过一段青藏高原的藏族地区，这将是外国人第一次走这条路线，为此，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人做了大量工作。

我摇上车窗，目视前方，在我们的面前，将有一条温长的丝绸之路，一块博大的欧亚大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般遥远。

第一站是石家庄市。

意大利远征队在中国境内将经过五个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太大，一个省够让人走上好几天，今夜，我们将彻夜行驶，明日黎明才可到达目的地。从北京到石家庄，一共才三百多公里，但我们仅有十几公里的高速公路，再说，伊塔拉的时速也只有三十公里。

夜深了，又下起雨。路两旁的田野黑压压的，天也格外冷起来。我想起卡尔罗，他们电视摄制组今晚仍留在北京，搞卫星转播，明天晚上才能与我们汇合。出发前，我是那样不愿与他分开，尽管只是一天。我这是怎么啦！莫非真的爱上了他？四年在法国都没爱上过一个法国人，怎么刚刚认识这个意大

利人就会动感情？我一定是疯了。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卡尔罗那张英俊的脸，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清晨六点钟，我们十辆车身披朝霞开进石家庄市。三百公里路，我们整整花了九小时。

算我在内，远征团一共二十七人，仅有我与电视台的记者卡尔拉是女的。其余的男队员有电视摄制组人员，菲亚特车手及机械师，另有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一名意大利新闻社记者、一名法国作家、三位邮电部系统负责卫星设备的小伙子，再有就是领队坦帝。队员来自意大利各个城市，最年轻的是二十八岁的菲利浦，最年长的是保罗医生，六十二岁，他曾参加过不少次徒步旅行。

我们很快就进了河南省。对这块土地，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是二十年前了，那般久远，又似就在昨天，父母来到五七干校改造，我们三个孩子也随之在此过了三年。

车队引起路旁农民的好奇，那目光酷似二十年前农民第一次见到我们。路上，许多瘦小的毛驴拉着车，车上装满了石子，重得好似要压塌了板车，二十年前我就总是同情这些小毛驴。路旁许多房子仍是泥土墙，除了衣着有些改进，其余似乎都是老样子。这几年在巴黎，看惯了繁华，再见眼前我们中国农民的辛苦，心中那滋味不好受。

车队向前行进，我一言不发，望着窗外，回忆着我在此度过的童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中国仍有许许多多人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坦帝看着我说。

“我在这儿生活过，对河南有着太深的感情！”

“你给我们讲讲那时的故事吧，我通过电话给大家翻译。”坦帝建议说。

每辆车上都有电话装置，十分实用。能记起来的都讲了，他们能懂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农村？

路上有两个农民抬着一顶纸做的花轿，纸的颜色以粉色为主，掺杂其它各种鲜艳的颜色，引起了意大利人的注意。其实，这东西在我的生命中也仅见过一次。这是两家为各自死去的孩子成亲，让他们在阴间作伴，过夫妻生活。纸轿里坐的是纸人，这个传统是令人心酸的。

这天中午，我们上了五公里长的黄河大桥。黄河水集中在中心，河床两边露出一大片黄色的泥沙。过了桥，我们来到花园口，一九三八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为了抵挡日本侵略军，扒开了花园口堤坝，大水淹死了约十一万老百姓。最后，日本军队还是开进来了。在村口，我们请了一位老农讲述当年的情景。

我们就在花园口野餐，伊塔拉停在黄河边，大家纷纷与老车合影。

三月二十九日

经过了河南省的安阳和郑州，我们到达了三门峡市，三门峡是黄河中游的一个峡谷，传说古时大禹到此治水，三斧劈开三座门：人门、鬼门、神门，黄河水得以导通。一九五七年，人们在此拦河筑坝，建成高 106 米，长 908 米，库容 96 亿立方米的大坝，可控制黄河流域面积 91%，可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等。

随着游人的增加，此地建了宾馆。我们到的时候，宾馆尚未完工，但已有二层可以住人。宾馆的女服务员身穿红色制服，个个面带微笑，又有几分腼腆，很有中国传统女性的风采。

那顿晚饭是我们上路以来吃得最开心的。黄河的鲤鱼鲜

嫩可口，吃着鱼，使我想起一个玩笑。在法国，一个傻乎乎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人的皮肤是黄色的，我说因为中国人喝黄河水长大。他又问我黄河的鱼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也是黄的喽。现在，吃上“黄”鱼使我十分高兴。

三月三十日

告别北京已一周了，车队开进了古城西安，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就是说，我们从此踏上了丝绸之路。

带着满身的尘土，我们直奔西安兵马俑坑。那天下午展览馆已经关门，但看到我们这二十多个队员满脸的尘土，展览馆专为我们开了门。

这是秦始皇的陪葬坑，有六千兵马俑，摆成气势浩荡的军阵，将士与战马都与真人真马一般大，意大利人为此惊叹不已。

八年前，我曾陪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来过西安，那次仅停留一天，走马观花。这次又是只能呆一天，什么时候能好好地看看西安呢？在西方生活了几年，反倒对我们东方的文化更感兴趣了。西安这个古城值得好好研究。

说到秦始皇，在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评论着他的功过。是他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第一次统一了中国；也正是他为了防北方匈奴，命修万里长城，为世界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宝贵古迹。然而，他又是一个暴君，焚书坑儒算得上统治者中最残酷的行动了。

几经历史盛衰，西安这个古代名城已失去许多光彩，但它仍是最值得观光的。

在西安使我想到陕西的窑洞，农民的白羊肚毛巾。陕西由于土地的贫瘠，成为中国数得上的穷地方。但这几年西安电影

制片厂却拍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几部电影。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住着最朴实的人民，艺术家也正是以这块黄土地及优秀的人民为基础，创造出成就。我在巴黎看了《红高粱》和《黄土地》两部片子，实实在在是被感动了。

另外，陕西的几位作曲家根据陕北民歌创作的中国摇滚乐曾风靡了整个中国。意大利电视台的人一到西安就张罗着买这些摇滚乐的磁带，想以此来配远征队在西安的活动的镜头。

在西安的这一天，司机与机械师们都忙着护理车辆，仅有伊塔拉的两名车手马里奥和爱尔索跟电视组去大雁塔拍摄。

大雁塔是唐朝时建的。高僧玄奘沿着丝绸之路西行到印度取经，回长安后在慈恩寺从事译经工作。他离开长安时年仅二十五岁，返回却已是四十三岁了，他把印度的万卷佛经译成汉文，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今天人们研究中亚及南亚历史地理所必读的史料。

大雁塔院中的香炉青烟袅袅，善男信女们烧香磕头，引得意大利这些天主教徒看得入神。在庙堂门口，坐着一个年轻的和尚，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经书，口中还念念有词。游人从他身边川流不息，但他似乎早已超脱尘世，浑然不觉。电视镜头对着他拍了许久，他好像也没留意。

我不是佛教徒，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信仰共产主义，长大了，什么都不信了。为此我也深感不安，因为我总以为人该有信仰，活得才充实。也许这些信仰根本就靠不住，像东方的佛教，西方的天主教等等，但至少人们会有一种精神支柱。

我们在西安仅有一天的停留时间，天却不给作脸，阴沉沉的，到下午就下起雨来。我还是叫上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小张开车到街上转转。这次体旅派出两辆车随远征队一直走到中

巴边境的红其拉甫。一部是解放牌大卡车，负责帮远征队拉一部分物品，另一辆是日本面包车。

西安的穆斯林极多，几年前见到他们在街上做羊肉泡馍，当时同来的老外不感兴趣，我也就没去品尝。这次很想同我们中国旅伴一起去吃，但赶上下雨，没有见到，远处也不想去，实在遗憾，来西安两次都未吃到西安风味。

西安的姑娘兴穿黑色紧身裤，很像巴黎的时髦，大多数都化妆，眉毛拔得细细的，脸上扑粉，倒是很有中国古代仕女的韵味。这些女孩子吸引了我们远征队的法国人芒德利，离开西安那天，他一个劲儿地夸，说她们风度翩翩，完全可以与巴黎女郎相媲美。怎么说呢，这些年在巴黎看惯了法国女孩，回到中国倒更觉得中国女孩细腻、典雅，是东方的美。在巴黎华人区，也可以见到不少华裔少女，但大多都西化了。在国内，见到地道的中国女孩，倒感到更有一番韵味。许多中国女孩到西方也学会了抽烟，这让我怎么也看不惯，总觉得中国女人文静的脸庞与烟卷格格不入。也许是我太传统、太保守了吧！

晚上，我们全队在旅馆大厅开会，坦帝讲些什么，我全都听不懂，别人给我简单地译成法语，大意是我们就要进甘肃省了，也就是说路越走越难，他让大家有所精神准备。

说到甘肃，想起我在巴黎的两个兰州朋友，小党与小耿。小党的两个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她说甘肃风太硬，给吹成这样。这回，该我去领教这大西北的硬风了。我倒希望它能吹红我的脸，免得一天到晚惨白惨白的。

四月一日

我们就要告别西安了。这天，全城都在搞义务劳动，从学生到军人全到街上清扫。意大利人搞不懂，问我这样做是否有

报酬。我做学生时也常出来这么干，什么时候挣过一分钱啊！搞卫星的小伙子安索说：

“在意大利如果不付报酬，没有人出来扫街道。”

也许，这就是因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表现吧！

现在我们踏上了丝绸之路。车队仍由中国警方开道车开路，伊塔拉随后，向甘肃省前进。

我坐在车里，思绪万千，在古代，人们是怎样开辟出这条伟大的丝绸之路？当时，没有任何公路建设，人们又是怎样穿过沙漠、高山和荒原的？想到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们，我忽然感到自己走这趟北京—巴黎之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毕竟我们是坐着车，虽说会有不好的路况，但到底是有路，而开辟丝绸之路的人是用双脚踏勘出路来的。

一路上，看见许多窑洞及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农民，只可惜车轮不停，无法去看看这些窑洞，与农民聊天。

进入甘肃省，风景与陕西几乎相同，都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地是干巴巴的，山坡也是干巴巴的。北方春天来得迟，虽已是四月份了，风仍是凉飕飕的。

我们进甘肃省的第一站是平凉市，这是个小城市，有点像县城。据说丝绸之路从西安通往河西走廊有南北两线，若走北线，平凉市便是必经之路。

进平凉市时正值夕阳西下，大街两旁的集市还未散，大多是卖蔬菜的。我们的十辆车在城外相互等候，一齐开进市里，招来所有人的好奇。大概丝绸之路从开辟至今，平凉人就没见过伊塔拉这种老车，车手又全副武装，灰绿色的连身装，白色头盔，大有鬼子进庄的架式。

我们住的平凉宾馆这晚正有舞会，翻译小马在饭厅特意叫大家饭后都去跳舞。我有种好奇心，究竟这边远的小城市的